

中國傳統音樂學會
三十年論文選

二〇〇一年一月

總主編 喬建中
副主編 蕭梅

「第三卷」
主編 田耀农

由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资助出版

总主编 乔建中
副主编 萧 梅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三十年论文选 (1980—2010)

第 三 卷

主 编 田耀农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三十年论文选:1980~2010. 第3卷/田耀农主编.

-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80692-565-2

I. ①中… II. ①田… III. ①传统音乐-中国-文集

IV. ①J6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6391号

出品人:洛 秦

书 名: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三十年论文选(1980—2010)·第三卷

总 主 编:乔建中

副 主 编:萧 梅

本卷主编:田耀农

责任编辑:鲍 晟

封面设计:蒋 熙

出版发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汾阳路20号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8

印 张:29.5

字 数:525千字

印 数:1-1,300册

版 次: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92-565-2/J.544

定 价:65.00元

本社图书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 <http://musicology.cn> 购买

编辑委员会(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王耀华 田耀农 乔建中 吴学源 周 吉
张伯瑜 张君仁 张振涛 洛 秦 萧 梅
樊祖荫

编辑小组

第一辑 徐天祥 特古斯

第二辑 杨成秀 黄 婉

第三辑 黄 虎

目 录

1 / 中国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	杨 红
14 / 荆楚遗风——跳丧	周 耘
35 / 钢琴缝中的奥妙	李 玫
58 / 论豫南皖西杠天神仪式用乐的三种观念	李敬民
75 / 琴曲《墨子悲丝》研究	王建欣
94 / 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	李幼平
112 / 民族音乐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相互关系及作用	方建军
133 / 民间歌手研究的口述史模式 ——理论视角与方法	臧艺兵
143 / 论民间歌手	张君仁
166 / 论互助土族民歌中的“风搅雪”结构	祁慧民
186 / 在田野中走近陈旸 ——关于陈旸及其《乐书》研究的民族音乐学方法选择与思考	郑长铃
201 / 论传统器乐合奏艺术中的乐队型态及合奏思维	肖学俊
225 / “武当民歌村”吕家河民歌考辨	李月红
238 /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特殊音色现象探微	郭树荟
253 / 论傩歌“啰哩噠”的生殖崇拜内涵	孟凡玉
271 / 从《三教同声》看明代宗教音乐的存在情况	徐元勇
280 / 论东北大鼓的兴衰	冯志莲
301 / 皖南民间戏曲音乐即兴创作 ——“加滚”的艺术特征与仪式生境	周显宝
319 / 世俗音乐的道教化 ——关于全真道经韵音乐与世俗音乐关系的探讨	孙 凡

332 / 论豫剧演唱谚诀的艺术特征	郭克俭
349 / 从“使琉球录”看琉球宫廷舞蹈的发展变化	刘富琳
368 / 《纳书楹曲谱》的记谱法与昆曲音乐	陈新风
377 / “马奈锅庄”实地考察与研究	杨曦帆
393 / 白茆山歌结构规律的计算机分析	王小龙
403 / 西安鼓乐中的大乐	褚 历
420 / 中国工尺谱的文化内涵	吴晓萍
434 / 传统京剧京胡伴奏音乐的宫调研究	赵志安
449 / “地方性知识”作用于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	王义彬
466 / 琴川泛新波,古琴奏和鸣 ——常熟虞山古琴保护传承现状调查与思考	施 咏
481 / 体验中的理解与见证 ——论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观念与方法	齐 琨
496 / 论曲调框架	杨玉成
513 / 哈尼族葬礼音乐在哈尼族音乐文化中的位置	曹 军

中国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

杨 红

21 世纪,伴随着世界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多样化,民族音乐学日益趋向整体化研究。而中国传统音乐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又是怎样以它特有的自然活态现状存活于民间文化土壤中,与现代化遭遇相适应?在田野中又怎样把握音乐与其相关联的文化因素的整体关系?笔者近几年通过对“西口路”和“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的实地考察,从实践中提出了对中国传统音乐活态资源整合研究的方略,从中获得深刻的音乐文化体验和田野中的音乐民族志构建。

一、传统音乐活态资源整合研究符合 当今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

受全球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虽然也面临着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同化的危机,但在各地政府相继推出的有关措施中,也得到不同程度地保护与开发。特别是在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地区,传统音乐依然

以其鲜活的存在方式活跃在社会现实中,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

传统音乐的活态资源即指当今鲜活的传统音乐文化生态,它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根植于民间历史文化土壤中,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如何在现代田野工作中去搜集、挖掘并加以完整地记录和描述,均要树立整体研究意识,将传统音乐以及存活相连的文化事象一并整合考察,这样才能使传统音乐鲜活的生存样式得到完整的保护,并从本质上加以认知和解释。

(一) 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是应当今大规模的复杂社会所需,是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创新课题

现今一个复杂的社会需要民族志式的活态观察,以获得不同地区相适应的客观真实样本,而不同样本之间的文化关联性将成为一个大型的综合研究,也就是整合性研究。

目前,中国国家级以及重点攻关课题均围绕着整体性的地域音乐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而展开。如2007年樊祖荫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等。可见,整体研究能为地区性的音乐生态与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措施提供建设性的、真实的文化资源和方略。笔者2003年的北京市人文社科研究课题《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和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西北高原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文化活态现状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其选题均从这些方面加以考虑。从我国经济建设布局看,西北高原是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重点地域,在人力、物力上将有重大投入。从人文民族关系看,和谐社会的建设任务十分艰巨又紧迫。从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看,自古以来该地区多民族音乐文化遗存丰富,须深入挖掘的资源十分雄厚,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能作出重大贡献。因此,有必要从总体整合的视角,对多民族音乐文化建设在新世纪的规划蓝图及时作出超前的构想,其基础理论工作便是对该地区多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活态现状作深入细致的考察、梳理、研究,达到总体的概观。该课题的创新之处,首先,表现在由于以往的交通不便,很多实地考

察是前人无法做到的,而从文化建设上提出高原联袂的研究方略更是首次提出;其次,这是国内外首次对秦直道音乐文化进行整体的考察与研究,从而提供一个完整的该地域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方略。

(二) 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是 21 世纪民族音乐学之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近几年来,全球化趋势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热门话题的宣传,引起了民族音乐学家的关注。2006 年在国内有一次集中探讨,如美国学者李海伦(Helen Rees)关于美国当代民间遗产的保护方案及发展的探索(李海伦,2006),中国学者从传承角度谈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冯光钰,2006;毛继增,2006)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考及理论探讨(樊祖荫,2006;洛地,2006;田青,2006;杨民康,2006;伍国栋,2006;项阳,2006)等,上述都表现出对当今传统音乐的保护认知和学术态度。

美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发展,在世界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和代表著述,导致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阶段性转型和发展。如梅里亚姆的三元结构模式(Alan, P Merriam, 1964)、内特儿的音乐与文化研究(Bruno Nettl, 2005)、西格的音乐民族志构建(Anthony Seeger, 1987)、雷斯的四级目标模式以及音乐体验和民族志的三维理论空间(Rice, Timothy, 1987、2003)等理论研究,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而又深远影响的理论框架,在中国也得到很大反响。近年来,美国一些民族音乐学家陆续被中国的音乐院校邀请讲学,如内特儿、西格、雷斯、斯洛宾、郑苏、李海伦、杰杰(DjeDje)等,他们不仅带来了世界上民族音乐学前沿学术信息,而且也建立了学院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教学均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理论视野,为中国学者的研究课题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支持,通过文献和交流,又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界带来了新一轮的学术前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化影响日益增长。跨学科的整体研究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的主要方向之一。如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音乐民族志(Musical Ethnography)、认知民族音乐学(Cognitive

Ethnomusicology)、音乐语境(Musical Context)、国家、政治与社会变迁(Ethnicity,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和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等领域,中国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个案研究范例,从中均凸显出新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并力求对研究对象进行跨学科的多元审视。如曹本冶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民间仪式音乐研究》(2003、2007)、张振涛的《冀中乡村民俗中的鼓吹乐社》(2002)、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和《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2003、2008)、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2003)、张伯瑜编译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2007)等等。可以说,传统音乐的整合研究就是在中外民族音乐学研究学理上,根据研究对象特质,综合上述多维视角,系统、全面、整体地关照一个音乐文化事象和群体的音乐文化事象丛,进行跨学科性质综合考察研究。另外,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也是立体化思维的结晶,以多元审视,从某一“乐种”的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点),到综合性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面),采用普查、定点考察、访谈、录音录像、参与民俗事象等多手段,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与研究,企望在历时与共时的多维纵横交织的坐标中,找到合理的文化解释。

二、传统音乐活态资源整合研究模式的理论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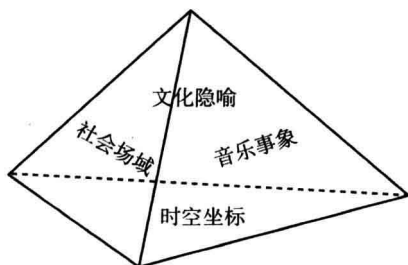
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论始终是学术探讨的前沿课题之一,然而,如何在实地考察中构建理论体系,则是一全新的学术需求。

如何从整体角度,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的田野考察,在实际的活态现状基础上进行传统音乐研究,从而提出整体性的理论建树和实际应用前景,为真正的传统音乐保护提供科学化的依据?笔者对秦直道上的传统音乐的考察研究就是以真实性、鲜活性作为首要的目标,继而把该地区众多鲜活的音乐品种整合在一个历史文化背景中,作为一个整体来挖掘、提炼、开发并保护,共同提供一个真实性、客观性、鲜活完整的整体面貌。其理论价值就在于对古代音乐文化在当代的遗存有一个完整地了解,继而为西北高原当

代音乐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实证性的丰富而鲜活的资源。通过这个调查,提出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略和规划。

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对小规模社会调查开始,就已经注意到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文化的特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特别是整合的需要。其中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而“路文化”恰是中国历史文明的一个缩影,从丝绸之路、西口路等多种传播路线,撒播下的是文化的种子。2003年,美国学者雷斯提出了时间、地点、隐喻是研究音乐体验和音乐民族志的三维理论框架,为笔者对活态音乐的整合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该理论的实际运用曾在笔者的《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2006)中得到具体运用和阐发。而整合研究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多维思考。

图一 整合研究模式:四面体金字塔模型



时空坐标(Space-time):雷斯曾在《音乐体验和民族志中的时间、地点和隐喻》一文中提出了“音乐体验中的三维空间”(three-dimensional space of musical experience)概念,以此建立“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音乐民族志”。因此,雷斯为音乐体验和民族志提出了三维空间:即时间、地点、音乐隐喻的理论研究方法(Timothy Rice, 2003: 151—152)。雷斯将时间维(time)界定为:“至少有两种方法来理解时间,一种是按年代顺序的或历史的,一种是按体验的(experiential)或现象的(phenomenological)。”(Timothy Rice, 2003: 162)

而当我们把研究对象锁定在某一文化区域时,时空坐标是首要因素。中

国作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若要认识音乐的文化风貌,必需着眼于历史背景,从它所处于的本土概念认知模式,以及展现音乐行为的整体环境和文化意义着手。这种从历时、共时、地域、社会、概念、行为、个体、音声之间形成互动关联的思维,是构成时空坐标的因素的理论基础。

时空坐标即指从历时(即按照年代顺序的)和共时(当今的时间和体验)双视角来进行跨时空的思维考虑,空间则更多的是确定地域范围。两者时常需要互动和转换思考。

社会场域(Society field):如何审定研究对象,需要由社会影响下的不同的点组成,雷斯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具有社会—地理意义上的地点维度的一种方法概念,这些嵌套的点有:个体的(individual)、亚文化的(subcultural)、区域的(local)、地域的(regional)、国家的(national)、地区的(areal)、散居的(diasporic)、全球的(global)、和虚拟的(virtual)。虽然这些空间可以是指世界的地理位置,对音乐体验同样重要的也有些是指一些音乐家和观众想象他们体验音乐的思想中的地点。(Timothy Rice, 2003: 161)而在整合研究框架中,笔者将分成两部分去理解,一是要确定这些具有社会意义上的“点”,即典型个体、亚文化、区域、地域、国家、地区、全球等,这主要从社会文化影响上来考虑,二是在研究对象具体的活动场域,确定研究脉络。这里又是具有一定地理位置的场域。在笔者的调查框架中,以传承人、传承链(组织)、传承的音乐形态和表演、传承曲目、活动区域以及生态环境及其活态现状为基本内容。

音乐事象(Music event):当今的活态音乐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鲜活地存活于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事象和民俗中,从而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若考察音乐,绝不能脱离其相依附的民俗事象,而是应加以整体研究,以便确定音乐在其中的形态、功能和作用。所以,音乐事象是一个集合名词,是音乐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密切结合的混合载体。

文化隐喻(Cultural metaphor):这是音乐事象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雷斯在隐喻维(metaphor)中,认为隐喻来自于一些信念,那就是,音乐的本质是通过形如“A是B”的隐喻来表达的。这些信念从而形成了对音乐和音乐行

为进行论述的基础。现在一般应用的隐喻有:音乐是艺术、认知、娱乐、治疗、社会行为、商品、象征符号和解释文本。(Timothy Rice, 2003: 163—165)笔者认为,雷斯试图把隐喻加到时间和地点上,构成一个三维空间,来表达音乐体验的不同含意。虽然隐喻这个词在这里的运用尚需探讨,但是,无需质疑的是,音乐体验和文化是通过人类的思维和认知而相互映像,音乐体验是文化的一种折射,音乐体验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展示。

上述四个维度,是互动的关系,时空坐标奠定了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刻内涵,给文化隐喻提供历史与现今时空的支撑,社会场域是在时空坐标下对研究对象的社会脉络及层面的构建,音乐事象是社会场域下的具体文化载体,是考察音乐民族志所在,而文化隐喻则是音乐事象的具体文化本质内涵和意义的阐释,三者互动从而构成整合研究之特色。

三、从“西口路”到“秦直道”: 传统音乐整合研究的全新文化体验

在中国晋西北、陕西、内蒙西部接壤的这片广漠无垠的黄土地上,跨越不同省地和民族,黄河长城从中交错,这里,既包含着黄土高原与内蒙古草原的过渡带,又蕴含着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融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该地区中国传统音乐蕴藏十分丰富,其中,产生在近代的西口路文化,蒙汉文化交融培育出了二人台、蛮汉调等多样传统音乐品种,构成了蒙汉音乐各异并相互交融的西口路文化区域。如追溯其更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历史上还有著名的秦直道在该地域延伸,这里曾经繁衍生息过匈奴、突厥、契丹、党项和后来的蒙、汉、回、藏等多个民族。这两条路在鄂尔多斯到包头地段是重合在一起的。这种路文化的传播,如同音乐史上张骞通西域所带来的民族交流盛况,均体现出“路文化”的整体传播特色,而从现今的活态音乐中均能显现出中原文化、北方匈奴文化的遗留以及成吉思汗留驻文化的并置及相融一体的历史文化特质。

走西口是中华大地历史上形成的重大迁徙之一,它上下 300 年,纵横

9000里。西口路文化首先是商业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大融汇文化。笔者于2002年至2005年,对西口路上的二人台音乐文化进行了整体研究,以历时三年持久扎实的田野考察以及丰厚的田野考察文本为基础,跟随当今民间戏班深入山沟僻壤间8次“走西口”进行田野实地考察,从多维视野对二人台进行系统性整体研究,搜集挖掘并考证记录了大量真实客观的田野文本,同时,以音乐体验和音乐民族志研究中的时间、地点和隐喻三维认知空间,针对中国本土音乐个案,从全新视角提出并构建了田野中的宏观—微观—互动三重研究层面以及对诸种田野文本的多向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从时间、地点、社会维护、文化象征等角度,展开了宏观与微观、过去与现在、原型与变异、局内与局外等层面的综合探究,希望能从“二人台”这一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文化事象上升到概括化的文化定性,转而寻访各种“文化流”的生命力。

笔者自2006年夏至今,在西口路音乐研究的基础上,又对秦直道沿线传统音乐活态现状展开田野调查,在西口路文化区域里及周边地区,与万里长城一样的工程浩大、撼人心魄的秦直道遗址是内蒙古、陕西境内保存下来的为数极少的古代交通遗址,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政权,防御外患,便于巡视北方,修筑了这条由陕西关中直达黄河河套阴山脚下的大型军事交通工程——秦直道。秦直道南起秦都咸阳,北达古阴山九原郡,全长736公里,中经17个县,纵贯渭北高原横山山脉、高原沙漠、黄河南北丘陵沙地。秦直道沿途,至今已发现:秦代行宫遗址16处,西汉房舍遗址60处,亭障遗址22个,烽燧遗址50个,发现了设于阳周县(今靖边县)蒙恬指挥直道工程的住所遗址,还发现在毛乌素沙漠区保存有较好的黑垆土古道。路面平均宽度约30米,最宽处约80米,由于道路大体南北向直,故称“直道”。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了“凿山湮谷,直通之”的描述。公元前33年,王昭君远嫁匈奴“胡汉和亲”,走的就是秦直道。^①秦直道在历史上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我国形成多民族的大家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已初步完成上段及

① 资料均据实地考察中所获文献整理而来。

中段的考察任务。

从陕西的咸阳淳化,到内蒙古包头区域,古代的秦直道、近代的西口路、当代的西安—包头高速公路,都在这个地区伸展,这里又是地形复杂的高原地区,融合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具有埋藏很深而又丰厚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

图二 秦直道古地图与现今地点对照



秦直道沿线实为高原联袂地域,北半段的河套文化和鄂尔多斯文化融合,传统音乐文化蕴藏深厚,鄂尔多斯古代民族,如匈奴、敕勒、党项等虽从名称上已消失,但是其古代民族音乐文化融合其中,遗存保留在目前当地的蒙古族音乐中,如蒙古族的长调、短调、器乐,成吉思汗陵的祭祀音乐、鄂尔多斯婚礼歌曲、宴歌中,还有蒙汉文化融合的品种二人台、蛮汉调、爬山调、山曲等,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品种共存互渗的文化生态。南段则有陕北高原特有的信天游、榆林小曲、陕北大唢呐、陕北说书、秦腔、碗碗腔、眉户戏、安塞腰鼓等多样民间音乐舞蹈品种。

2006年8月,笔者带领研究生及地方学者一行5人,沿秦直道沿线实地考察了秦直道的内蒙古段(秦直道北段),对包头市西南孟家湾村麻池古城、昭君坟渡口——金津、二狗子湾古城、鄂尔多斯东胜西南漫赖乡秦直道遗址“古路豁口”等地进行了实地踏查,对该地域传统音乐文化活态现状进行了宏

观抽样普查,为课题研究进行了实地考察论证,而在2007年和2008年夏的后续考察中,确定了具体的典型个人以及相关组织,如二人台民间戏班、婚礼音乐及音乐家、准格尔蛮汉调、鄂尔多斯宴歌、乌审旗文化独贵龙(民间组织)、榆林小曲等考察事项。

在前期西口路音乐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对音乐品种及其相属的音乐事象展开面上的考察,在秦直道北段,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融的音乐遗存及其近代蒙汉文化交融的活态现状复杂而多元化,考察的音乐事象包括包头城市公园的老年二人台演出、宝格特风情园的蒙古族音乐文化展演、黄河边汉化的蒙古村落的蛮汉调和二人台演唱、伊金霍洛旗鄂尔多斯宴歌、准格尔的蛮汉调、鄂尔多斯婚礼音乐(蒙汉结合)、乌审旗嘎查村那达慕、乌审旗沙漠草原牧民家(独贵龙)的鄂尔多斯长调及短调歌曲、榆林小曲、统万城下庙会的陕北说书等。(下述照片均为作者拍摄)

图三 秦直道音乐事象(一)



包头公园二人台表演



宝格特蒙古民歌演唱



鄂尔多斯婚礼音乐



鄂尔多斯宴歌

图四 秦直道音乐事象(二)



毛乌素沙漠牧民的鄂尔多斯长调演唱



榆林小曲



嘎查村的那达慕蒙古歌舞表演



统万城下的陕北说书

对秦直道沿线传统音乐文化的整合研究,不同的音乐事象具有其特有的文化隐喻所指,但它们有着大一统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秦直道大大缩短了中原与边疆的距离,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原民族与北方各部族经历长期战争的结果,是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我国北方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大融合,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秦直道的考察正在日益深入,新的成果告诉我们,它不仅是民族和亲之路,而且是民族团结、商贸发展文化交流之路。它沟通南北,促进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张光耀,2007:155—156)。如在鄂尔多斯婚礼音乐及鄂尔多斯宴歌中,其演唱习俗、伴奏乐器依然保留其传统特色,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和特征,在当今的传承和演变过程中显露出昔日的文化特质。